

丘濬与海南名贤的交往

■ 金满楼

话说成化年间，丘濬返琼葬母时，启程前还闹了个乌龙事件。当时，一些与丘濬有嫌隙的官员见他回乡时带了几个大箱子，便以为里面是金银财宝，于是上告。但办案人员前往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书籍，令告发者羞惭不已。

守孝期间，丘濬与海南当地乡贤多有来往，如多次从琼山（今海口市琼山区，下同）到文昌探望邢宥。邢宥，字克宽，号涓邱，他于正统十三年（1448年）中进士，初在刑部任职，后任四川道监察御史、浙江台州知府、浙江布政司左参政、都察院左金都御史等职。邢宥为官清廉善断，刚正不阿，后与丘濬、海瑞并称“海南三贤”。

邢宥和丘濬同生海南，同朝为官，气节相尚，道义相砥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邢宥比丘濬年长5岁，于成化六年（1470年）先行致仕并隐居家乡文昌。丘濬结束守孝回京前，专程去文昌与邢宥道别，后者深知此生难再见，一直把丘濬送到琼文交界处的葫芦铺（今约亭）并口占一绝：“与君相送到葫芦，酒在葫芦不用沽。共饮一杯辞别去，君行西去故人无。”此诗载着深情厚谊，先贤之间的惺惺相惜，跃然纸上。

此外，丘濬与琼山唐氏家族也关系匪浅。作为当地的望族，唐氏家族早在明初时就科甲鼎盛，并一直有教化当地的传统。唐氏家族中，唐舟、唐亮父子为永乐朝进士，唐胄为弘治朝进士，而丘濬、王佐、海瑞等名贤均出自唐氏门下。

除受教于唐氏外，丘濬还娶了唐舟之女为侧室，而王佐之母唐朝选为唐舟侄女。因为这层关系，王佐年少时曾从学于丘濬，并于正统十二年（1447年）中举，时与广东著名理学家陈献章被称为同榜“二俊”。和丘濬一样，王佐也十分好学，精于著述。丘濬晚年时，曾以未能编著海南地方史志为憾。王佐继承师志，所著《琼台外纪》为海南本土人士编写地方史志的开山之作。之后，其再传弟子唐胄在此书基础上编写《琼台志》，海南历史上第一部完整传世的地方史志就此诞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一代名臣海瑞曾从学于唐胄，可以说是丘濬的三传弟子了。□



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的约亭(原称“邢丘贤别纪念亭”)。资料图

丘濬相关雕版。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

丘濬陈列馆展出的拓片。陈望 摄

丘濬陈列馆展出的明代象牙笏板。陈望 摄

琼州学宫走出的布衣卿相

■ 金满楼

著述资政 立正求实为表率

从政作为 殚精竭虑献良策

国力。

第二是立国求正，帝王和官员尤其要做表率。在十二个方略中，丘濬将“正朝廷”作为首要，其中又以劝帝贤明为根本。弘治五年（1492年），丘濬借天降异象上言：成化年间彗星三现，遍扫三垣，又有地震发生。近来彗星重现，地震天鸣不已，怪鸟宫中鸣叫。这种异象，令人警惕。陛下应修身清心，以立根本；同时要节约财物，勤于政务，不可偏听偏信于阿谀求宠的小人。如此一来，天灾才能消除。对于官场弊政，丘濬提出要“严纪律，正百官”，以法纪和道德对官员实行双重约束。此外，丘濬认为求正应从基础做起，尤其应在教育和教化上下功夫，因为后者的正邪兴衰直接影响到国家治乱和社会风气。

第三是治事求实，以经世致用为宗旨。丘濬从政后，一直保持求真务实、清正勤勉的作风，不被虚名所惑，为朝中大臣所钦服。在翰林院任职期间，他参与编撰过多部重要的官修史书，包括《英宗实录》《宪宗实录》等。众所周知，修史之人重在史德和史识。在修撰《英宗实录》时，有人为讨好皇帝而提出于谦在“土木之变”后拥立景泰帝的行为是“叛逆”，应按“不轨”定罪评价。丘濬则认为，当时如果不是于谦挺身而出，不但朝廷危险，国家也岌岌可危，黎民百姓将遭受更大的苦痛。尽管后来

正统皇帝夺位成功，但于谦的功绩不能不客观评价。丘濬的这一做法，得到后世史家高度认可，如清人王士禛就认为他治史“持论严正”。

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期间，丘濬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《大学衍义补》。《大学》为四书之首，《大学衍义》为南宋真德秀所著，不过丘濬认为该书存在不足，未能真正解决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实际应用问题。为此，他在十年间殚精竭虑，用尽平生学力，最终写出了160卷的《大学衍义补》。

《大学衍义补》成书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年）。弘治帝1488年继位后，丘濬上呈此书，以求推广。弘治帝阅后，称赞该书“考据精详，论述贲博，有神政治”，并下令刊印发行。

丘濬为官数十年，对明朝弊政可谓了然于胸。为了“广充格致诚正之功，用臻修齐治平之效”，丘濬穷搜古今治国理政的典型事例，一事一例，条分缕析，务求经世致用。在《大学衍义补》一书中，丘濬从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诸多方面陈述了治国理政的十二方略，又提出二十二条具体建议。总体观之，其政治理念主要有三点：

第一是民为国本，治国理政应以亲民、养民为重。如其所言，“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，尽教养斯民之义”，“自古帝王，莫不以养民为先务，而不知立政以养民，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！”如何亲民、养民？他提出，为政者首先要“制国用”，赋税上应“薄取轻敛”“宁轻勿重”，所谓“治国者不能不取乎于民，亦不能过取乎于民”，只有理顺赋税和经济的关系，才能富民强国，天下太平。其次，丘濬认为“善于富国者，必先理民之财”。为此，他分设“蕃民之生”“制民之产”“重民之事”等十条目展开论述，目的是引起官员对发展经济的重视，以真正改善民生、增强

名传胪，仅次于一甲的状元、榜样、探花）的成绩高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并在散馆后顺利成为翰林院编修（正七品）。

在翰林院为官时，丘濬主要参与了《寰宇通志》《大明一统志》等官书的编写。期间，他充分利用皇家典藏图书资源，博览群书，学问日渐渊博，见识愈加精深。之后，他被选为经筵讲官，为成化帝讲解经书。这一阶段，丘濬仕途一帆风顺，先后晋升为侍讲（正六品）、侍讲学士（从五品）、翰林院学士（正五品）。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，丘濬任国子监祭酒（从四品），因治学严谨、为人正派受到学子尊崇。

弘治帝即位后，丘濬升为礼部尚书并掌詹事府事，同时担任《宪宗实录》副总裁。弘治四年（1491年），《宪宗实录》修成，丘濬被加封为文渊阁大学士，入内阁参预机务，行宰相之职。在海南古代史上，至此位者仅丘濬一人。弘治七年（1494年），丘濬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后，他以年事已高、精力不济再三请辞，但弘治帝极力挽留，不予批准。弘治八年（1495年）二月初四，丘濬在任上因病去世。弘治帝得知消息后，下旨辍朝一日，赐宝钞一万贯，追赠“太傅”，并谥“文庄”。

对于丘濬一生功业，在之后万历和天启朝两度出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曾评价说：“孝陵十八年治平，实自公启之。经国大业，舍公将谁归哉！”这一评价并非溢美之词，可谓持平之论。

丘濬，字仲深，海南琼山人。7岁那年，丘濬之父丘传去世，祖父丘普伤心之余而自题“可继堂”匾额，并书联“嗟无一子堪称老，喜有双孙可继宗”。据丘濬在《可继堂记》中所言，祖父将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丘濬兄弟两人身上，希望兄长丘源“承吾世业，学为良医，以济家乡”，丘濬则“拓吾祖业，达而为良相，以济天下”。正如祖父期待的那样，丘濬从小“惕厉自持，不敢失坠”，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代名臣。

据记载，丘濬自小爱读书，勤奋好学，可惜家贫可读之书不多，不得不经常借阅他人藏书，“尝走数百里借书，必得乃已”。丘濬母亲李氏知书达理，她在丧夫后守节教子，时时“课其学业”，从不倦怠。即便丘濬已在京为官，丘母仍不时致书，时时“课其学业”，从不倦怠。即便丘濬已在京为官，丘母仍不时致书，“戒谆谆以忠谨，图报国为言”。在这种家庭教育的熏陶下，丘濬一步步成长为儒学大师。

正统九年（1444年），首次参加广东乡试的丘濬一举夺魁，成为本次科考的解元。是年，丘濬才24岁，可谓少年得志。可惜的是，接下来的会试丘濬没能再传捷报。直到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，已两次在会试中落榜的丘濬以二甲第一名（即第四

明代海南籍名臣

丘濬（1421年—1495年）去世百余年后，万历《广东通志》（成书于1602年）引用生活年代稍晚于丘濬的名士何乔新（1427年—1502年）之语，把丘濬与唐朝张九龄及宋朝余靖、崔与之称为“岭南人物之首”。丘濬历事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四朝，期间六转官阶，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，是海南古代唯一位居宰辅的先贤。那么丘濬到底做了什么，竟能获得“文臣之宗”“布衣卿相”“中兴贤辅”等身后名？

丘濬雕像。资料图